主题栏目：中国文化域外传播研究

DOI：10.3785/j.issn.1008-942X.CN33-6000/C.2019.07.311

【主持人语】中国文化域外传播研究以具有鲜明特色的中国文学文化传统为研究对象，探究其在域外的传播现状、传播路径、传播效果等，是向世界讲好中国故事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服务于国家文化发展的一个重要研究方向。

与传统文学文化研究相比，中国文化域外传播研究有以下三个特点。其一，鲜明的跨学科性。中国文化域外传播研究需要各学科交叉融合，涉及翻译学、语言学、传播学、中国文学等等。其二，与翻译学关系密切，但又区别于通常意义上的翻译学研究，主要体现在关注点和落脚点的差异。一方面，翻译是中国文化域外传播的重要媒介，但作为媒介的翻译是单向的，不是双向的，仅涉及汉译外；另一方面，既然是传播研究，就要考虑传播过程中的各个环节，翻译是传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却非全部。其三，在传播研究中，不仅应关注言语内容的传播，亦应重视非言语内容的传播力量。

本栏目的三篇文章能够彰显以上三方面特点。三位作者学术背景不同、研究兴趣有异，但三篇文章都展示出中国文化域外传播研究的学科广度。《美国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管窥》是国别研究与文学研究的产物，跨越了古代与现代、域内与域外的时空界限，认真梳理了美国汉学家对中国古代文学的研究与贡献，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京味文学英译研究的多维文化再现》以京味文学为抓手，讨论其翻译如何实现中国文化的再现，是关注文化特色的翻译研究；《〈骆驼祥子〉译本封面的多模态符际翻译研究》则超越了基于文字的言语翻译范畴，以 47 个外译本封面元素为对象，从语言学、符号学的角度进一步探讨符际翻译问题，研究与发现均别具一格。通过这三篇文章，我们特别希望拓宽中国文化域外传播研究的广度，讲好中国故事，树立中国文化自信。

本栏目特约主持人：北京语言大学　吴平教授

美国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管窥

梁　霞

（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 东亚语言与文化系，密苏里 圣路易斯 63130）

[摘　要] 美国中国古代文学研究具有如下基本特点：第一，重视文本的英译，并将英译与研究紧密结合。第二，研究者多具有英美文学、比较文学、西方理论的背景，注重跨界研究以及与西方文学研究的对话。第三，注重具体作家、作品或者某一文学体裁的研究，研究成果大多不以文学史的形式呈现。第四，中国女性文学研究是近二三十年来的一大热点，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第五，关注文学与宗教、社会史、文化史等的关系，把文学置于广阔的社会生活背景之中进行研究与分析。随着中美信息和人员交流的增多，两国相关领域的研究会更加趋向融合，其差异越来越表现为个体之间的差异，而非两国整体的截然不同，美国中国文学研究今后可能的发展趋势也将继续体现上述特点。

[关键词] 美国；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特点；发展趋势

[收稿日期] 2019－07－31
[在线优先出版日期] 2020－03－02
[本刊网址・在线杂志] http://www.zjujournals.com/soc
[网络连续型出版物号] CN 33-6000/C
[基金项目] 2019 年北京语言大学引智项目“跨学科时代语言研究的理论与方法”

[作者简介] 梁霞（https://orcid.org/0000-0003-2185-9407），女，美国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东亚语言与文化系教学教授，文学硕士，主要从事汉语国际教育与中国文学研究。

一、引　言

本文探讨的美国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主要是对在美国接受研究生阶段中国文学的专业教育，并主要在美从事相关教学与研究的学者的研究成果的归纳和总结，偶尔兼及加拿大学者的研究成果。其中包括曾在美学习、工作后去其他地区任职以及目前主要在美工作，同时或曾经在美以外地区兼职的学者。其研究成果有些是在美用英文发表的，有些是在大中华地区用中文发表的，还有些则是先用英文发表后翻译成中文再次发表的。本文侧重点在中国古代文学研究方面，偶尔涉及现当代文学研究。研究者的工作单位标注的是目前的或最后一个。

美国高等院校中，耶鲁大学首开风气之先，于 1877 年设立了汉学教席，由在中国工作了 40 余年的著名传教士兼外交官卫三畏(Samuel W. Williams，1812—1884)担任此职[1]。1879 年，第一位赴美任教的中国举人戈鲲化(1835—1882)在哈佛大学成功开设了以教授传统诗文为主要内容的中文课[2]。此后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于 1890 年、哥伦比亚大学于 1901 年、夏威夷大学于 1921 年、芝加哥大学于 1936 年、斯坦福大学于 1937 年相继设立汉学教职[3]。这一阶段的汉学研究对象以古代中国为主，涵盖文、史、哲等人文学科的诸多领域。研究人员多不是专业学者，而是传教士或有过中国工作经验的外交官、海关工作人员、探险家等，他们主要供职于高等院校以及各大图书馆和博物馆。

1941 年日军偷袭珍珠港，美日交战，美国迫切需要训练大批通晓中日语言和文化的军人开赴亚洲战场，同时需要大批相关领域的研究人员。耶鲁、哈佛、科罗拉多等大学受军方委托，开设了中文速成强化项目，高等院校也因应形势的变化，大幅增设了相关课程。二战之后，一批在战争中接受过中国语言、文史方面培训，在亚洲学习或工作过的学者，如哈佛大学亚洲研究中心的创立者、著名汉学家费正清(John King Fairbank，1907—1991)，普林斯顿大学东亚系的创立者、明史专家牟复礼(Frederick Mote，1922—2005)等开始在高等院校任职并从事汉学研究工作。一批大学设立了东亚语言与文化(或文明)系。具有一定规模的中国语言与文学项目大多隶属东亚系，具有鲜明的区域研究的特点；也有些隶属现代语言与文学系。东亚系学者的研究方向包括中国语言、文学、历史、艺术史、人类学等诸多内容。汉学及东亚学不是按照专业而是按照研究对象的地域划分系科，这在美国高等院校体制中是很少见的。20 世纪五六十年代之后，汉学家们的专业分工更加细化和明确，中国文学研究逐渐成了汉学研究中特色鲜明、成果甚丰的领域。

20 世纪 60 年代之前，在美国从事中国文学研究的多不是汉语母语者，60 年代起这一情况发生了显著的变化：一方面，来自中国台湾、香港等地的华人学者加入了中国文学研究领域；另一方面，随着越南战争的爆发，国防外语奖学金数额增加，取得研究生奖学金可推迟服兵役的时间，因此进入研究生院从事中国和亚洲研究的美国学生大增。不少反对越战的青年将亚洲研究视为切实可行的改变世界的途径之一。由于冷战期间不能去中国大陆，他们只好选择其他地区，“研究当代中国的博士生大多去香港；以中文流利为首要目标的，或希望在‘传统化’中国做实地考察的往往去台湾；也有一些博士生选择去日本，师从当时成就卓著的日本中国史专家”[4]3。这一时期美国政府和福特基金会对区域研究模式给予了很大的支持和鼓励。“‘区域研究’的根本信条是：仅仅掌握某种语言是不够的；也就是说，一个打算研究中国政治学和方法论的学者必须在懂得语言之外熟悉中国的历史和文化。对美国人(或中国人之外的其他种族的人)来说，这种全面训练的最快途径是选修中国研究课程。”[4]7

1979 年中美建交后，两国教育界交流日增。80 年代末起，美国东亚系的博士点开始在中国招生，众多中国学者赴美留学或从事研究工作。学生群体的变化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东亚系的课程

设置,因为以中文为母语的研究生不需要像美国研究生那样花大量时间扫除文本阅读中的语言障碍。他们往往选修一些与中国或者亚洲研究没有直接关系的理论课程,掌握西方的理论术语和批评框架,在治学方法上向西方学术界靠拢。而此期招收的美国博士生也与老一辈汉学家不同,他们大多在中国留学或工作过,对当代中国有比较直观的了解,入门阶段的基础语言训练已不是其博士课程的主要内容。“中国的开放不仅改变了中国史研究者的身份组合,而且它还对中国史研究的课题选择有很大的影响”[4]4,去中国研究的机会增加,开放的档案材料越来越多,面谈和民意调查也更能得到配合。这使学者们有机会做想做的论题,并修正其之前的研究结论。“由于去日本留学的博士生越来越少,日本学界对中国史研究的影响普遍下降,而中国学术界的影响则相应上升。”[4]4上述观点虽是主要针对中国史研究而言,但笔者认为也适用于中国文学研究的情况,原因如下:首先,历史研究本身也包括文学史;其次,对作家和文学作品的研究离不开对其所处的历史和社会的研究;再次,现代意义上的文学概念并不适用于古代的中国文学研究,中国古代文史哲不分家,广义的文本概念是非常宽泛的,例如有些史学著作也被视为文学文本;最后,美国学界的中国历史研究与文学研究的关系通常比较紧密,区域研究的形式也促进了跨界研究,注意不同学科之间的渗透与借鉴。

中美交流的深化以及现代科技的发展一改过去在美国难得看到中国文学研究刊物和书籍的历史。20世纪90年代以后,美国东亚图书馆逐渐可以通过网络浏览中国主要图书馆的馆藏目录,检索中国期刊。全美图书检索中的注音逐渐改为汉语拼音。除信息资料交流之外,人员往来也随着交通的便捷而大幅增加。由于中美学者研究的互补性很强,近年来两国的中国文学研究不再是彼此隔绝、互不相干了;两者间的不同或许越来越表现在作为个体的学者的研究方法上的差异,而非两国学术整体上的不同。

美国的中国文学研究一般包括以下几个部分:先秦两汉的诗歌和散文研究;六朝至唐朝的诗歌与散文研究;宋元的戏剧、诗歌与散文研究;明清的白话小说、文言小说、戏剧、女性文学研究;近现代文学,包括19世纪90年代到20世纪40年代太平洋战争爆发期间的小说、戏剧、诗歌和杂文研究;1949年以来的当代文学研究(也有学者把五四运动以来的中国文学研究统称为现代文学研究)。与20世纪60年代不同,近年来,研究小说、戏剧与电影的学者明显多于研究诗歌的。

英语世界先后创办了一系列中国研究方面的期刊,比如《美国东方学会会刊》(*Journal of the American Oriental Society*)、《通报》(*T'oung Pao*)、《亚洲专刊》(*Asia Major*)、《哈佛亚洲研究学报》(*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亚洲研究杂志》(*Journal of Asian Studies*)、《中国文学》(*Chinese Literature: Essays, Articles, Reviews*)、《中国中古研究》(*Early Medieval China*)、《唐代研究》(*Tang Studies*)、《男女》(*Nan Nü*)、《明史研究》(*Ming Studies*)、《晚期中华帝国》(*Late Imperial China*)、《现代中国文学》(*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等,都是较为重要的学术刊物。此外,还出现了许多提供不同研究领域信息的网站。

综上所述,美国大学正式设立汉学教席至今已有近一个半世纪了,早期研究者以曾有中国生活经历的非专业人士如传教士、外交官、海关工作人员、探险家等为主。早期汉学侧重中国古代历史和文化的研究,专门从事中国文学研究的十分少见。二战的爆发使社会急需大批了解中国语言文化的专门人才,极大地促进了汉学的发展。二战结束后,不少大学都设立了东亚系,以区域研究而不是按照学科的形式开展教学与研究,其特点之一是诸多学者从事跨界研究。随着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的爆发,东亚乃至整个亚洲研究因得到美国政府及私人基金会的支持而得以迅速发展。20世纪60年代后,大批来自中国港澳台地区的华人学者加入汉学包括中国文学的研究,文学研究逐步成为汉学研究中一个独立的分支。70年代末中国改革开放、中美建交之后,美国高校与中国相关学术机构的交流日益频繁,特别是80年代中后期以来,大批中国学者赴美攻读中国文学硕博士

学位或进行访问交流活动。90 年代后，美国大学逐步实现了与中国文献资源的网络共享。中国文学的重要文本和研究著作在美国多可看到，美国的很多研究成果也被翻译成中文。中美在中国文学研究特点上的总体差异正在逐渐缩小。

二、美国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的若干特点

多年来，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一直是美国汉学研究的重要领域，不但学者人数众多，发表成果较多，所设相关课程和学生人数也比较多。直到 20 世纪 90 年代，这一情况才发生了显著的变化，现代文学研究也开始兴盛起来。具体来说，美国的中国古代文学研究至少呈现出以下几方面的特点。

（一）重视对中国文学作品的译介

就总体而言，美国学者在中国文学作品的英译方面做出了杰出的贡献。英译不但为英语世界的一般读者提供了了解中国文学的文本，更为相关教学与研究奠定了基础，提供了便利。美国这一领域的知名学者多出版过中国文学作品的英译著作。英译是一个从版本的鉴定和选择入手，经过反复细读文本、考察源流、推敲琢磨，选择适用于读者对象的语言风格以及相应的目标语文体进行翻译的过程。译作发表时，译者多以序言形式展示其研究成果，体现对文本的深刻理解。这是美国中国文学研究的一种传统形式。

例如，明清文学与古代小说研究专家、哈佛大学的韩南（Patrick Hanan）教授是李渔的《肉蒲团》《无声戏》以及《十二楼》选集等作品的英译者，同时也是李渔及其作品的重要研究者。再如，亚利桑那大学（曾任教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奚如谷（Stephen H. West）和哈佛大学（曾任教荷兰莱顿大学）的伊维德（Wilt L. Idema）教授不但合译了《西厢记》，还对其研究做出了重要贡献。在英译本的“引论”中，他们不但对《西厢记》的创作过程、演出情况、主要版本、他人的评点成就、人物塑造特点、观众接受情况等进行了全面、详细的总结和归纳，还特别对《西厢记》在西方的流传译本，如法语译本、西班牙语译本和德语译本等进行了较为详细的评介，并概括了英译本的特点：“我们的目标是毫无保留地为西方读者提供一种尽可能接近原文的文学翻译。我们认为这对于此版戏剧是十分重要的，因为其刻画人物的诸多特点之一便是在不同角色间，甚至是同一角色内语域的转换。有人可能会认为我们过于直译，可是我们一向认为，诉诸英语中的陈词滥调来简化那些对读者积极介入会带来挑战的段落，既无必要也不可取。我们之所以如此翻译，是坚信西方的读者可以富有想象地与译文进行融通，就像 13 世纪的中国古人阅读原文时的感受一样。”[5]130

译作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美国这一领域的学生和学者对中国作家作品的认识。无论原作多么精彩，如没有译本，海外读者和研究者也大多难解其中滋味，有兴趣了解中国文学的人也会大为减少。有些作品因被翻译成多种语言，在海外影响甚广，其影响甚至反作用于中国文学研究。比如《赵氏孤儿》的译本，虽然翻译的最初动机是该剧有较长的宾白，便于外国阅读者和学习者更好地了解当时的汉语口语，但译本反而“进一步加强了该剧在建构中国传统文学史的现代主流叙事中的经典地位”[6]38。

反观被称作“一代之文学”的宋词，虽然在国内的研究者很多，而在美国取得的研究成果相对较少，主要原因就是宋词的翻译不足。固然词在英文中没有完全对应的文体形式，但律诗、绝句等在英文中也没有对应的文体，一般只是采取大致押韵和字数大致相同的方式进行英译。词与诗最大的不同在于长短句交错形成的节奏和韵律，非常依赖汉字单音节的属性。词的英译在内容上没有障碍，但在形式上很难再现，英译后可能很难区分诗和词，也就体现不出词的特殊意义了。

英译本使传统的中国文学作品在异域文化中获得了新的生命。北美有些学者将大量精力投入

到翻译中,如余国藩(Anthony C. Yu,芝加哥大学)译《西游记》,芮效卫(David Tod Roy,芝加哥大学)新译《金瓶梅》,罗慕士(Moss Roberts,纽约大学)译《三国演义》,宇文所安(Stephen Owen,哈佛大学)译《杜甫诗全集》。近年来,由于多数大学不再把译作列为评审和考核终身教授的成果,刚从事中国文学教学与研究的学者较难优先考虑从事中文文本的英译,往往只有在专业领域已打下一定基础、不需首先考虑晋升的学者才有时间和兴趣从事此类工作[7]607。

中国文学作品的英译有不同的风格,以翻译当代文学作品见长的葛浩文(Howard Goldblatt,圣母大学)强调可读性的重要性,其译作因主要面向美国一般文学作品的读者,意译和再创作的成分较大。"'意译'派在出版方面更胜一筹,因为无论是商业出版社还是大学出版社都推崇意译派的译著。对此,无论我们是庆幸也好,悲伤也罢,事实依旧是,在那些'可译'的小说里,'可读性好'的译作才能出版。"[8]189

与之相反,罗慕士翻译的《三国演义》多采取直译,内容非常丰富,包括序言、正文、跋以及注释,还有主要人物表、重大事件表、头衔与职务表、当时的行政区划图、重大战役路线图等。连套语也都如实译出,朝代的年号、宫殿名,汉语的谦辞、敬辞、习语和典故等也都反映了原作的风貌,对小说的版本、作者、风土人情等都进行了详细的解释,是忠实原作、适合研究者和专业人员阅读的译文典范[9]258。

韩南在总结上述情况时指出:"所有的翻译本身都是在两种文化背景之间进行居中调停的工作,如果要对翻译进行满意的描述,两种文化都需要考虑进去。"[10]134每个译本都在两极之间,一极是全方位的保存,另一极则是全方位的同化,"大部分翻译作品都处于两者之间,既非彻底的保存,也非彻底的同化","小说的译者很少在整部作品中始终如一","在一个更高的分析层次上,翻译几乎不可避免地要同化原著中的主题和人物类型,使之符合读者自己的文化"[10]135。

很多译者有意识地尝试平衡两种翻译风格,例如白之(Cyril Birch,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在翻译《牡丹亭》时就力求如此并取得了成功[11]。杨曙辉和杨韵琴的《喻世明言》《警世通言》和《醒世恒言》共120篇译本也调和了两类不同读者的需求,是近年的优秀译作。

综上所述,文本的英译是美国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的基础,也是众多知名汉学家投入了大量心血的领域。笺注性翻译是海外中国文学研究的特色,也是早期汉学研究注重文本研究这一指导思想的体现[7]607。文本的译者往往也是该作品的重要研究者。汉英两种语言及其所代表的文化存在着概念体系的不对应,因此无论译者对两种语言掌握到何等娴熟的程度,都不能避免翻译上的不完全匹配性,都不免要借用西方已有的概念和表达方式阐释汉语中特有的话语,从而造成扭曲、转换不准确的情况。赞助商、出版商和编辑的介入也可能会扩大译本与原始版本之间的差异。对此我们无须过度忧虑,译者心目中的读者对象决定了其翻译风格。如果预设的读者群是目标语的普通读者,译者可能会有更大的自由度去"重新创作"一部文学作品,以适合读者的需求和口味,其译作不一定是原始作品在另一语言中的复制,正如葛浩文所指出并实践的那样。如果译作的主要读者群是学术型读者,其成员可能精通目标语,并可能已阅读过原著,那么忠实性或许是应优先考虑的,有时甚至要不惜牺牲译文的可读性和审美价值。为了弥补原文与译文在语言和文化上的差异,译者往往需要借助必要的诠释手段,正如罗慕士在翻译《三国演义》时所做的那样。多数翻译可能是努力平衡二者,或在翻译不同部分(如对话或叙述)时体现不同的特点。无论采用哪种翻译风格,译本都对美国中国文学的读者和研究者产生了十分重要的影响。

(二) 注重跨界研究以及与西方文学研究的对话

美国中国文学研究者的教育背景、生活经历与中国同行不尽相同,其中相当大一部分研究者是研究英美文学出身,这使他们在研究中国文学时有一种比较的视野和跨界研究的特点,也更注重借鉴西方文学的研究视角和理论来实现中西方文学研究之间的对话。比如夏志清在接受研究生教育

并开始从事教学科研时，恰逢美国文学批评界盛行“新批评”理论，他深受影响，“往往以西方十九、二十世纪的小说标准（如福劳贝尔或詹姆斯的作品）来衡量中国古典小说。这一标准简单地说就是要求叙事视角的连贯，小说文意前后一致，小说作者应在叙述中避免直接介入或作任何直接的道德说教，故夏氏对中国明清小说有时不免过于苛求”[12]217。

韩南则是在英国接受的基础训练，起初研究英国文学，因偶然接触中国古典文学作品产生了浓厚兴趣而转入这一领域的研究。就世界政治、经济、文化的东西方格局而言，韩南从研究英国文学转到东方文学，他具有的双重知识背景有利于他产生新的见解[13]132。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的何谷理（Robert Hegel）和宇文所安都出生于二战以后的美国本土，毕生精力主要放在中国古典文学研究方面。宇文所安曾赴日本学习，对东方诗歌有极为深邃的感受和洞察力，其成就主要在唐宋诗方面。何谷理出生于密歇根州的一小农庄，其居民多为欧洲移民，他们对各自国家丰富多彩的描述使何对大千世界充满向往，渴望了解不同肤色和民族的人们的生活状况。其学中文的最大动力是对中国文化的兴趣，而美国学校的历史课本几乎不涉及中国文化，直到进入密歇根州立大学他才有机会学习有关内容[13]132。

伊维德是荷兰人，20 世纪 60 年代末美国汉学专业的学生都到中国台湾地区留学，但由于荷兰已跟中国建立了外交关系，他无法赴台湾地区留学，而中国大陆的大学又不对外开放，于是选择去日本留学。他因不喜欢社会学而改学中国文化，参加过元曲阅读会，70 年代末起与美国的奚如谷等合作进行研究[14]。

20 世纪八九十年代中国留美学者从事中国文学研究的多为国内英语系师生。这些学者和美国本土学者的英语背景使他们与美国主流学术界盛行的批评潮流和理论联系较为密切，除上面提到的夏志清对中国小说的批评，近二三十年来美国学界对性别理论的运用、对中国女性作家的研究等也都体现了这一特点。

与夏志清等人沿用西方文学标准衡量中国文学作品不同，何谷理等认为中国文学有自身的文体特点，中西文学有不同，无优劣。例如 fiction 一词多被翻译成“小说”，但中国小说的定义、结构形式等与西方不同。如中国传统长篇小说是散韵结合的章回体，有的注重道德教化，每章开头多有开场诗，采用全知视角叙事，人物的心理活动通过人物动作、语言等表达，每章末尾用诗词和“且听下回分解”作结。再比如中国传统戏曲形式也与西方的 drama 不同，它是唱念做打的四位一体，如元杂剧，开头有楔子，之后有四折，剧本形式上不同于西方戏剧。何谷理强调不应以西方类似的文学体裁的特点作为标尺评判中国文学，这对在美从事中国文学研究的学者来说是至关重要的。

当代理论席卷欧美学界，影响了美国的中国文学研究甚至中国的学术研究，奚密（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认为这至少有两个主要原因。第一，当代理论是充满魅力的，新知识、新理论能带来新的方法，让人们看到新的景观。第二，欧美的当代理论在传播新知识时，还带有一种普遍的道德诉求，特别是现今热门的后殖民理论、性别研究等，对各种不公平包括族群之间、性别之间的不公平，或者经济制度等造成的不公平及其背后的权力机制都进行了批判。理论的运用使研究者具有更宏观的视角，更有益于赋予文学现象和文学研究一种普遍性的意义。但也造成了现行研究中某些简单套用理论的倾向[15]。例如，有些研究者把很多当代文学作品都解读为政治寓言，其看似深刻的理论锋芒掩盖了对具体作家作品深入把握的不足。还有研究者先搭建一个理论平台，然后用中国文学作品简单地附和、证明理论的正确或重要性，从而给文学研究带来了某些不良影响。

一般来说，美国学者对中国文化和文学的特质都给予了充分重视。大部分研究古代文学的学者都非常重视作品所处的历史背景和语境，对传统汉学的研究方法，包括训诂、考证等都有准确的把握，如韩南教授对话本小说的考证。如前所述，美国研究者多具有比较的视野，但他们大多不会轻易地在其研究中套用某些时髦的理论或术语。这并不是说北美学者不重视理论，大部分学者对

理论都是下过一番苦功的,西方学界几乎所有著名的理论都有学者应用于中国文学研究中。但就大多数学者而言,文本是首要的,是重中之重。这当然是美国自新批评流派以来重视细读或精读传统的表现,很多发现、发明都是从细读文本而来的。不但注意细读文本,美国学界还比较重视副文本,即文本附带的序跋、评注、插图等等非正文的内容。陆大伟(David Rolston,密歇根大学)对明清小说的评注研究、何谷理对插图的研究即是其中代表。

美国的中国文学研究植根于西方学界、脱胎于西方文艺批评的理论和传统,因此与中国传统的文艺批评方式存在一些差异。不管是何种批评理论和批评方法,都决定了美国学界的研究论述主要是分析性的,而非赏鉴性的。中国传统的文艺批评主要是诗话词话、小说评注,就整体而论,对风格的赏鉴和感性的体会是中国文艺批评独有的特点,此特点传承到今天也体现在诸多研究性论述尤其是诗词研究中。外国学者在语言上较难进行这种风格、情感上的评鉴,理性、科学的学术传统也使得他们的论述一般是提出问题并加以分析。这是美国学界相对于中国比较突出的一个特点。

(三)注重具体作家、作品或文学体裁的研究

从研究成果的汇集形式上来看,美国的研究者们相对比较关注特定的作家和文本以及特定的文体,较少编辑出版大型的中国文学史,仅有的几部都是名家写作的精品,这与中国近几十年间出版了上千种各类文学史的情况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例如先秦两汉文学研究中,只有华兹生(Burton Watson)的《早期中国文学》(*Early Chinese Literature*,1962)一部专著。学者们的主要研究都集中在解读和分析文本上面,语文学和历史学的方法在文本分析领域影响最大,此"领域在很大程度上也没有受到最新西方文学理论的影响"[16]583。

在中古文学(建安—隋唐)研究方面,直至1971年才有了华兹生的《中国抒情诗:2世纪到12世纪的古诗史》(*Chinese Lyricism: Shih Poetry from the Second Century to the Twelfth Century*)这部对从汉到宋的诗歌进行概述性的、以名家名著为结构的专著。宇文所安的《初唐诗》(*The Poetry of the Early T'ang*,1977)、《盛唐诗》(*The Great Age of Chinese Poetry: The High T'ang*,1981)、《晚唐诗》(*The Late Tang: Chinese Poetry of the Mid-Ninth Century* (827—860),2006),林顺夫和宇文所安合编的《抒情之声的生机:东汉到唐代的诗歌》(*The Vitality of the Lyric Voice: Shih Poetry from the Late Han to the T'ang*,1986),孙康宜的《六朝诗研究》(*Six Dynasties Poetry*,1986),田菱的《阅读陶渊明:历史接受范式的变迁》(*Reading Tao Yuanming: Shifting Paradigms of Historical Reception*,2008),田晓菲的《尘几录:陶渊明与手抄本的文化研究》(*Tao Yuanming and Manuscript Culture: The Record of a Dust Table*)等,集中代表了这一时期中国文学研究的重要成果。其主要形式还是聚焦这一历史时期的主要作家、特定文体即诗歌的研究,关注"产生这些文学作品的社会和文化语境与功能,作者对它们的应用,以及读者对它们的接受"[17]616。

从主流上看,北美的宋金元文学研究中对各文体的单项研究仍占主导地位。此外,致力于宋元剧曲和市民文学研究的也颇有人在,对原作的翻译则更是不胜枚举。最早一部有力度的宋诗研究著作是日本汉学家吉川幸次郎(Yoshikawa Kojiro)的《宋诗概说》,英文版由华兹生翻译(1967)。其研究旨在说明宋诗在风格、主题和格调上有别于唐诗传统而另辟蹊径,反对宋诗不及唐诗的贬论。这激活了北美学者对宋诗的想象,从而以新眼光看待宋诗。王国维提出的一代有一代之文学,客观上造成了国内相对忽视不占主流地位的文学形式的研究倾向,但在北美这种情况似乎不那么明显。虽然文体的不对应带来了研究上的困难,但宋词研究依然取得了一些成果,如刘若愚(James J. Y. Liu)的《北宋主要词人》(*Major Lyricists of the Northern Sung*,*A. D.* 96 - 1126,1974)。孙康宜的《晚唐迄北宋词体演进与词人风格》(*The Evolution of Chinese Tz'u Poetry*:

From Late Tang to Northern Sung，1980）通过大量英译来解释晚唐（主要是温庭筠、韦庄）经五代至北宋末期词体和词的主题所发生的变化，该书是第一部对词体做丰富分析的英文专著。田安（Anna M. Shields，普林斯顿大学）的《精雕一集：〈花间集〉的文化语境与诗学实践》（*Crafting a Collection：The Cultural Contexts and Poetic Practice of the Huajian Ji*）指出，《花间集》不但是宋词之源，而且也体现了唐代文化的影响，她关注蜀国宫廷文人热衷于创作和表演这些词所反映的社会意义。叶嘉莹也对宋词研究做出了重要贡献，其学生方秀洁（Grace S. Fong）的《吴文英和南宋词的艺术》（*Wu Wenying and the Art of Southern Song Ci Poetry*，1987）是此领域的代表作[18]。另外艾朗诺（Ronald Egan，斯坦福大学）对李清照研究做出了重要贡献，他认为《词论》是李在受人攻击、遭遇困境时做出的抗争和表达的希望。宋代文人对李的批评策略是通过对她进行道德审判，即批评其再婚和离异，达到否定其文学成就的目的[19]。傅君励（Michael Fuller）的《东坡之路》（*The Road to East Slope：The Development of Su Shi's Poetic Voice*，1990）也是重要研究成果。

元杂剧方面除有若干比较有影响力的研究著作之外，也有相当多的翻译作品，如柯润璞（J. I. Crump，密歇根大学）的《忽必烈时期的中国戏剧》（*Chinese Theater in the Days of Kublai Khan*，1980），伊维德、奚如谷的《中国戏剧资料 1100—1450》（*Chinese Theater 1100－1450：A Source Book*，1982）等[18]。

明清文学是美国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的重镇，这与哈佛大学知名汉学家费正清的研究思路和提倡或许有一定关系。作为现代汉学研究的奠基人，他强调中国研究为美国的当代政治和社会服务，主张研究从考据学中走出来，多关注中国的近现代历史和文化，从而对中国未来的发展方向做出某种预测。而要了解近现代中国，就要了解中国明清到近代的发展过程。除此之外的另一可能因素是，夏志清、韩南、何谷理、浦安迪（Andrew H. Plaks，普林斯顿大学）等知名学者杰出的开拓性贡献，使明清小说研究成了显学，同时美国也受到国内红学热的感染，促使明清研究似乎后来居上，盖过唐宋研究的风头。就总体而言，美国研究明清文学的学者相对较多，成果亦颇丰。费正清也因这种研究思路得到了可观的研究资助并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奠定了其作为美国现代汉学开创者的地位。

北美明清文学研究以白话小说成就最为引人关注。早期成果以夏志清的《中国古典小说》（*The Classic Chinese Novel：A Critical Introduction*，1968）为代表。如果说夏是以古典和现代小说批评家著称的话，韩南则是以文学史家和翻译家著称于世。他以《金瓶梅》版本研究奠定了学术声誉，转而研究话本小说，其专著《中国的短篇小说：关于年代、作者和撰述问题的研究》（*The Chinese Short Story：Studies in Dating，Authorship and Composition*，1973），对中国话本小说的历史做了分期研究，时至今日，仍然是最客观和详尽的关于话本写作年代的研究成果。其《中国短篇白话小说史》（*The Chinese Vernacular Story*，1981），对当时海外可见的话本小说做了详尽的梳理考证，勾勒出截至 17 世纪末话本小说发展的清晰脉络。与夏志清所持的“中国小说不足论”相反，韩南认为传统的中国白话小说体现了 18 世纪英国小说所具有的“形式现实主义”的一切特征。韩南翻译过大量的李渔作品，1988 年出版《李渔的创作》（*The Invention of Li Yu*）一书，进一步剖析了其全部作品[20]。

其后浦安迪的《〈红楼梦〉中的原型与寓意》（*Archetype and Allegory in the Dream of the Red Chamber*，1976）把这部小说的结构归纳为“双重互补”。这是运用西方现代理论阐释中国文学的重要著作，比夏志清的类似做法走得更远。他还倡导重新关注清代小说评点，其成果反映在《中国叙事学》（*How to Read the Chinese Novel*，1990）中。在《明代小说四大奇书》（*The Four Masterworks of Ming Novel：Ssu ta ch'i-shu*，1987）中，他利用传统评点，在审视明代文化史的背景下对《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和《金瓶梅》的结构与意义进行了详细解读，并提炼出这四部小说的共同主

题是自我完善即修身,还强调小说作者与小说中人物之间具有讽刺意味的反差。他认为反讽是中国小说叙事特色的观点对众多学者产生了重要影响。

何谷理在第一本专著《十七世纪的中国小说》(*The Novel in Seventeenth Century China*,1981)中对以往研究关注不足的非主流作品如《隋唐演义》等予以了特别关注。他的《阅读中华帝国晚期插图小说》(*Reading Illustrated Fiction in Late Imperial China*,1998),将晚明小说的物质实体即印刷品作为研究对象,对这一时期出现的精美插图、发展轨迹以及影响文本阅读的可能方式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从而拓展了小说的研究领域。余国藩因一系列《西游记》研究文章和百回四册全文译注(*The Journey to the West*,1977—1983;2012)而声誉卓著,此后他转而研究《红楼梦》,出版了《重读石头记:〈红楼梦〉里的情欲与虚构》(*Rereading the Stone: Desire and the Making of Fiction in Dream of the Red Chamber*,1997)。

目前活跃于这一领域的翘楚包括马克梦(Keith McMahon,堪萨斯大学)、黄卫总(Martin Huang,加州大学尔湾分校)、葛良彦(圣母大学)、李前程(路易斯安那州立大学)、魏爱莲(Ellen Widmer,卫斯理学院)、吕立亭(Tina Lu,耶鲁大学)等。马克梦的《十七世纪中国小说的因果关系》(*Causality and Containment in Seventeenth Century Fiction*,1988)是晚明色情小说研究的专著,其《吝啬鬼、泼妇、一夫多妻者——18世纪中国小说中的性与男女关系》(*Misers, Shrews, and Polygamists: Sexuality and Male-Female Relations in Eighteenth-Century Chinese Fiction*,1995)则独到而详细地探讨了清代小说中的男女关系。黄卫总的《文人与自我表现:十八世纪中国小说中的自传性情感》(*Literati and Self-Re/Presentation: Autobiographical Sensibility in the Eighteenth-Century Novel*,1995)是研究《儒林外史》的重要专著。葛良彦的《出自边缘:中国白话小说的兴起》(*Out of the Margins: The Rise of Chinese Vernacular Fiction*,2001)是研究《水浒传》的力作,探讨了中国叙事文学语言白话化(vernacularization)这一重大主题,并且对书面体白话(written vernacular)在《水浒传》中的文学功能加以审视。

美国学者编撰的大型综合性文学史中比较有影响的,一是梅维恒(Victor H. Mair)主编的《哥伦比亚中国文学史》(*The Columbia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2002)。此书建立了一种十分宏大的文学观,研究对象包含了中国大陆、港台及少数民族作品等。全书按照诗歌、散文、小说、戏剧四大文类而不是历史年代编写。开篇专设"基础"部分,介绍中国语言文字、谚语、佛教文学、道教文学等的特点,四大文类后面加上了"注疏、批评和解释"部分,其中探讨了经学与小说评注等。编者采取的从世界文学看中国文学的视角,是其与中国学者编写的中国文学史的最大不同。该书有精彩的章节,但缺乏一种统观全局的构思。第二部巨著是孙康宜、宇文所安主编的《剑桥中国文学史》(*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2010)。此书是按照历史年代,"采取更具整体性的文化史方法"精心编写的,其"宗旨和理想是既要保持叙述的整体连贯性,又要涵盖多种多样的文学方向"。这部文学史"较多关注过去的文学是如何被后世过滤并重建的"[21]序言2-3,是一部优秀的文学史。

北美大学的运作方式对学术研究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学者们选定的论题通常不大,他们把主要精力放在将题目做精、做深上。这种研究模式也直接影响到了美国大学中国文学课程的设置。这些课程大体上分成两类,一类是给本科生开设的公共课、基础课,另一类是给硕士生、博士生开设的专题研究课。学者们根据个人的研究兴趣和专长授课,一般不需要像中国国内中文系的课程设置那样将中国文学史分为古代文学史、近代文学史、现代文学史以及当代文学史等。多数课程注重介绍中国经典作家及其作品,但不追求大而全,也比较强调从某特定角度、特定文体或者特定历史时期出发,介绍对作家作品的研究成果。比如中国鬼故事、爱欲小说、中国古代女性作家研究等等。

综上所述,美国中国古代文学研究总体上较为重视特定作家和作品的研究,也注重某一文学体裁如诗歌、小说等的研究,特别重视文学与其他领域的跨界研究,如文学与宗教、文学与文化以及文

学与社会的联系。有些在中国因各种社会原因研究相对不足的作品如《金瓶梅》《肉蒲团》等，在北美的研究者和研究成果都比较多。相对而言，编写大部头综合性文学史并不多见。这与美国中国文学研究更是一种个人化的工作，相对较少进行有计划的、集体性研究有关。综合性文学史编写虽然数量不多，但质量都比较高，体现了编者特定的文学观念以及从世界文学的角度观照中国文学的独特视角。因美国中国文学研究领域的刊物比较有限，学术成果的发表也有更规范和严格的审查机制，总体而言，与中国相比，美国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一般强调聚焦具体问题，论文和专著发表的数量没有中国多，有些研究尚属空白。

（四）中国女性文学研究的兴起

近二三十年来，美国学界在中国女性文学特别是古代女性文学研究方面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果，这是美国中国文学研究的一大特点。女性文学与女性历史研究关系密切，一方面文学史是整个妇女史的有机组成部分，另一方面妇女史的研究成果又促进了文学研究的发展。20 世纪 90 年代初以来，美国对中国妇女史包括妇女文学史的研究兴趣不断增加。这既有西方女性主义研究第三次浪潮的影响，也有中国文学研究领域女性学者日益增加带来的影响。这一领域的领军人物是孙康宜等。孙康宜率先发表了《明清妇女诗集及其编选策略导读》（*A Guide to Ming-Ch'ing Anthologies of Female Poetry and Their Selection Strategies*，1992），还与魏爱莲合编了《明清女作家》（*Writing Women in Late Imperial China*，1997），与苏熙源合编了《中国历代女作家选集：诗歌与评论》（*Women Writers of Traditional China*：*An Anthology of Poetry and Criticism*，1999）。稍后伊维德和管佩达（Beata Grant，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合编的《彤管：中华帝国时代的女性书写》（*The Red Brush*：*Writing Women of Imperial China*，2004）所选作家作品覆盖面更宽，不但收入了女性作家的诗歌、散文与戏剧，还包括了弹词等文体，从而勾勒出一幅中国女性文学发展的全景图。该书也是最全的一部中国女性作品翻译集萃。

中国 17、18 世纪才女们的文学活动、社会角色、文化贡献等在伊佩霞的《内闱——宋代妇女的婚姻和生活》（*The Inner Quarters*：*Marriage and the Lives of Chinese Women in the Sung Period*，1993）、高彦颐（Dorothy Ko）的《闺塾师：十七世纪中国的妇女与文化》（*Teachers of Inner Quarters*：*Women and Culture in Seventeenth-Century China*，1994）和曼素恩（Susan Mann）的《缀珍录：十八世纪及其前后的中国妇女》（*Precious Records*：*Women in China's Long Eighteenth Century*，1997）中得到了充分的反映。从社会史的角度出发，她们认为，如果把中国女性在漫长历史发展过程中的地位仅仅看作被压迫群体被动地服从历史赋予她们的角色地位，就不免太过片面了，因为不同家庭背景的女性的社会地位、个人生活空间不同，每个历史时期女性的权利和对女性的道德要求也有差异。但她们并没有具体讨论女性文学作品本身的具体内容和意义[20]。

孙康宜 2006 年就说道："从学理上讲，过去二三十年，美国乃至整个西方性别研究，基本上是遵循由差异观到迫害论的思路，由此探讨性别'差异'所造成的权力关系和文学的传承观念。"[22]104 中国文学界对女性作家作品的研究率先打破了在历史上妇女一直受压迫、被奴役的刻板印象，提出中国女性也有受到男性文人帮助而在文学上取得成功的一面。"一般人总以为西方的文化理论可以为中国文学研究带来崭新的视角，但却很少有人想过中国文学的研究成果也能为西方的批评界带来新的展望。"[22]105

20 世纪 90 年代末以来，中国妇女史研究更加细化，研究领域进一步拓展，涉及与医学、婚姻法、财产继承、性别制度、宗教体系等诸方面的关系，同时注意发掘女性的能动性和主体意识。例如魏爱莲的《美人与书：十九世纪中国的妇女与小说》（*The Beauty and the Book*：*Women and Fiction in Nineteenth-Century China*，2006）"研究了 19 世纪女性主动追求作家地位、力争发表作品的现

象;它还指出,在19世纪末,中国女性已经成为小说的批评性读者、编辑者、评论家,这一现象又使小说界开始认识到迎合女性读者的重要性"[23]3。

综上所述,90年代兴起的针对中国女性文学所做的社会史、经济史、作家生平、作品创作等诸多视角的研究,呈现了中国文学史上女性作家的特殊贡献与文学成就,挖掘了一大批以前不为人知或者尚未引起广泛重视的作家作品,英译了大量文本,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中国女性文学的奠基人谭正璧等人的研究成果,扭转了五四以来学界比较普遍的片面认识,即认为中国女性只有受迫害的一面,其意义无疑是十分重大的。虽然女性作家研究已经成为中国文学研究领域的显学,但就总体而言,历史上中国女性作家依然处于男权社会的大背景之下,应该在多大程度上承认中国女性文学创作的自主意识和特殊性,中国女性是不是与欧洲女性在地位和文学成就上有巨大的差别,中国女性特殊论的普遍意义究竟有多大,中国女性文学的研究成果应该如何引起西方学界的重视并被西方女性文学理论所吸收等,是一系列引人深思、需要继续深入探讨的问题。

(五)关注文学与其他领域的关系

美国中国古代文学研究总体上比较注重探讨文学与其他领域的关系,例如文学与宗教的关系。"文学与宗教本身有着密切的联系,各朝代文学尤其是我所知道的唐宋文学,是和当时的佛教、道教分不开的,这也许在一般的文学史尤其是中国国内的文学史上确实看得不够清楚,学者们也不够注重这一方面,但是美国汉学界很看重,这是美国汉学家与国内搞文学史的学者的区别所在。"[11]166其原因或许是基督教文化与西方文学关系密切,研究者从西方文学的传统出发,更容易联想到宗教与中国文学的关系。中国学者过去对文学与宗教的关系探讨得不够充分,或许是因为1949年以后中国学者对从宗教的角度研究作家作品总体上有所忌讳,或许是因为当代中国研究者多数都没有任何宗教背景,或许是因为中国文学研究的思维空间尚需拓展。

相当大一部分北美学者对佛教在中国文学中的作用颇感兴趣。如管佩达的《重游庐山——苏轼生活与写作中的佛教》(*Mount Lu Revisited: Buddhism in the Life and Writing of Su Shih*, 1994)研究了佛教与苏轼生活及其作品的关系,显示了佛教之于苏轼生活和思想的重要意义,同时也指出了苏轼在寻求佛教解脱与士大夫所具有的国家责任感之间的矛盾和张力[18]626。李前程的《悟书:〈西游记〉、〈西游补〉和〈红楼梦〉研究》(*Fictions of Enlightenment: Journey to the West, Tower of Myriad Mirrors, and Dream of the Red Chamber*, 2004),探讨了源自禅宗的"悟"在《西游记》《西游补》和《红楼梦》中的文学表现形式与意义。

综合性研究《哥伦比亚中国文学史》第一编"基础"设第九章"佛教文学"、第十章"道教作品",也从宏观的角度专门探讨了宗教与文学创作的关系。施寒微(Helwig Schmidt-Glintzer)在论述佛教的影响时指出:"由于文学广泛地反映了人类的整体经验,所以在这一新的宗教生根中国之际,佛教对所有这些活动的影响便立即体现在佛典和非佛典作品中。在文学中,除了直接反映出佛教信仰之外(如对僧人、庙宇、宗教仪式、佛像和绘画的描写),佛教还影响了中文中数不清的更为精微的方面,如说唱形式,复杂的诗学规范、美学标准、文学体裁、戏剧程式,以及最重要的——对虚构想象领域的接受和认可。"[24]187

再如,北美不少学者对印刷技术与中国文学发展的关系进行了深入的探索。如王宇根的《万卷:黄庭坚与北宋晚期诗学中的阅读与写作》(*The Thousand Scrolls: Reading and Writing in Huang Tingjian and the Late Northern Song*, 2011)是英语世界中第一本探讨北宋印刷术的传播对阅读和写作之影响的专著。其研究侧重探讨印刷术的出现和文本的大量刊行如何改变了人们对阅读和写作的思考。他认为黄庭坚的诗法或方法是针对急剧增加的书籍做出的反应。艾朗诺的《美的困扰:北宋士大夫的审美思想与追求》(*The Problem of Beauty: Aesthetic Thought and*

Pursuits in Northern Song Dynasty China，2006）则通观诗学及其他相关领域，包括金石学、花谱、艺术收藏和诗歌。他在书中考察了 11 世纪新兴的一些美学思想和追求，并努力探求诗学和其他相关领域之间的关系[18]629。明清出版业的发展情况也是明清文学研究的一个方向，代表作有包筠雅（Cynthia Brokaw，布朗大学）和周启荣（Kai-wing Chow，伊利诺伊大学香槟分校）合编的《中华帝国晚期的印刷与书籍文化》（*Printing and Book Culture in Late Imperial China*，2005）。

总体而言，北美学者更倾向于把某位作者或者某个时期的作品放到一个更为广阔的背景中观察，考量其与文学之外的其他领域的关系。无论这样的关联是宗教的、社会史、文化史或其他视觉艺术的，这种比较研究往往带来了新的研究成果。毋庸置疑，这与近二三十年来北美学界盛行的跨学科研究风气密切相关，也与研究者本人的学术背景紧密相连。这或许与北美学者是中国文学的“旁观者”“局外人”有关，他们认为只有将中国文学置于更广阔的背景下进行研究才能独辟蹊径，更好地理解中国文学自身的特点以及与其他学科的相互关系。

三、美国中国文学研究的发展趋势

本文所谈的美国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的特点是就一般情况而言的。随着近年中美学者之间人员往来的频繁与互联网带来的信息交流的便捷，双方的相互借鉴与融合会逐步增加，地区差异会进一步缩小。或许我们可以预见如下发展趋势：

第一，美国越来越多的研究者开始用中文发表专著、专论，与此同时，大量英文专著、专论被译介成中文发表，这样可在使用汉语的国家和地区获得更广泛的关注。过去三十年间用中文发表中国文学研究成果的机会大幅增加，而用英文发表的机会却没有这种明显的变化趋势[20]649。这促进了中美两国在中国文学研究领域的合作与相互借鉴。

第二，中国文学的研究范围会进一步扩大。近二十年来文学研究已从古代文学领域扩展、延伸到其他领域，如法律（何谷理）、电影（张英进）、音乐（Andrew Johns）、思想史（丹敦）、跨语境实践（刘禾）、文化生产（贺麦晓）、流行文化（王瑾）、性别（钟雪萍）、城市（李欧梵）、殖民主义（周蕾）、政治学（林培瑞）和人类学（Gang Yue）等[25]1。这种扩展预计还会继续。

第三，从本科生到博士生，近年对中国古代文学感兴趣的人相对减少了。随着传播媒介的改变，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对影视、音像制品表现出更大的兴趣，研究电影和现当代文学的教师职位正在代替研究古典文学的教师职位。一方面，古代文学研究的便利性大大增加，教授中国语言文化的教师数量增加；但另一方面，从事古代文学教学与研究的青年学者人数却逐渐减少。这一局面并非中国文学研究所特有，美国人文学科的诸多领域都是如此。

第四，越来越多的中国作家会更有意识地寻求作品英译的机会，这是使作品获得国际认可，扩大读者人数，提高个人知名度，实现作品经典化的一个重要途径。比如铁凝曾主动联系张洪凌博士翻译其作品《大浴女》，张在这个方面的贡献是巨大的。国外读者和观众对中国现当代作家作品、影视作品以及网络媒体资源的关注在一定程度上也会带动并促进他们对整个中国文学（包括古代文学）的关注与兴趣。例如 2019 年 9 月中国动画片《哪吒》在美国影院上映，获得良好反响，这也许会带动部分观众对哪吒这一人物在中国古代文学作品中的来龙去脉和历史渊源做更深入的探究。

第五，“中国的形势仍然影响着美国的中国历史研究。中国二十年以来经济上的突飞猛进不仅给我们在中国做研究创造了更舒适的条件，而且还造成了大学中中国历史课需求量的增加，从而间接地为中国史学家提供了更多在大学供职的机会，为研究性（型）大学中国史博士点设立的扩大提供了更充分的理由”[4]8。这一点对整个汉学研究包括文学研究都适用。

第六，信息来源增多和原始资料爆炸式增长，为本领域的研究既带来了方便，也带来了甄别、选

择上的困难,这对资料相对丰富的明清文学研究的影响尤其突出[20]649。

何谷理教授在谈到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的发展趋势时曾指出:中国古代文学研究已经具有了两种倾向,还应继续坚持。首先,研究者们需要具备广博的知识,社会学、历史学、文化学等的训练都是不可或缺的,同时也应关注现在流行于世的作品。文学研究讲究敏锐的领悟与感同身受的情感共鸣,进入作家的创作语境等等。"其次,应把(中国)古代文学看成世界文学的一部分,这就意味着比较研究,并且要求古典文学的学者熟悉异文化的语言与文学传统。对文学理论知识,以及艺术与哲学的学养积累,都是很重要的。"他提出了推动世界范围内中国古典文学研究的意义:"在我的信念中,一直渴慕帮助每一个人认识世界各人种应该是多么地平等、一致,这是一个人文学者的基本工作,无论现在的我们是否具有(多么)明显的差异。"[13]136

(本文在写作过程中得到了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何谷理教授及王蔚、洪书欣、吕珏老师,三一大学张洁教授,路易斯安那州立大学李前程教授,北京师范大学郭英德教授,北京语言大学吴平教授等诸多师友的帮助,在此一并致谢!)

[参 考 文 献]

[1] 顾钧:《卫三畏与美国早期汉学》,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9年。[Gu Jun, *Samuel Wells Williams and Early Sinology in the United States*, Beijing: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2009.]

[2] 张宏生编著:《戈鲲化集》,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2000年。[Zhang Hongsheng (ed.), *Ge Kunhua Anthology*, Nanjing: Jiangsu Classics Publishing House, 2000.]

[3] Sung S., "Sinological Studies in the United States," *Chinese Culture: A Quarter Review*, Vol. 8, No. 2 (1967), pp. 150-160.

[4] [美]伊佩霞:《总序:美国的中国史研究趋向》,见[美]伊佩霞、姚平编:《当代西方汉学研究集萃(妇女史卷)》,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第1-8页。[Ebrey P. B., "Preface: The Trend of Chinese History Studies in America," in Ebrey P. B. & Yao Ping (eds.), *A Collection of Contemporary Western Sinological Studies: Woman's History*, Shanghai: Shanghai Classics Publishing House, 2012, pp. 1-8.]

[5] [美]奚如谷、[荷]伊维德:《王实甫的〈西厢记〉在中国文学中的地位》,吴思远译,《国际汉学》2015年第2期,第121-130页。[West S. H. & Idema W. L., "The Status of Wang Shifu's *Story of the Western Wing* in Chinese Literature," trans. by Wu Siyuan, *International Sinology*, No. 2 (2015), pp. 121-130.]

[6] [荷]伊维德:《中世纪中国戏剧的多种形态:如何改编文本以满足演员、观众、审查官和读者的不同要求》,何博译、程芸校译,《长江学术》2015年第3期,第33-38页。[Idema W. L., "The Many Shapes of Medieval Chinese Plays: How Texts Are Translated to Meet the Needs of Actors, Spectators, Centers and Readers," trans. by He Bo, proof. by Cheng Yun, *Yangtze River Academic*, No. 3 (2015), pp. 33-38.]

[7] 田晓菲:《关于北美中国中古文学研究之现状的总结与反思》,见张海惠编:《北美中国学——研究概述与文献资源》,北京:中华书局,2010年,第601-622页。[Tian Xiaofei, "A Summary and Reflection on the State of Middle Period Chinese Literature Study in North America," in Zhang Haihui (ed.), *Chinese Studies in North America: Research and Resources*, Beijing: Zhonghua Book Company, 2010, pp. 601-622.]

[8] [美]葛浩文:《关于中国现当代文学在美国的几点看法》,潘佳宁译,《当代作家评论》2014年第3期,第188-192页。[Goldblatt H., "A Few Thoughts on Chinese Modern and Contemporary Literature in the U. S.," trans. by Pan Jianing, *Contemporary Writers Review*, No. 3 (2014), pp. 188-192.]

[9] 李国庆:《美国明清小说的研究和翻译近况》,《明清小说研究》2011年第2期,第257-268页。[Li Guoqing, "Latest Development of Ming and Qing Fiction Studies and Translations in America," *The Journal of Ming-Qing Fiction Studies*, No. 2 (2011), pp. 257-268.]

[10] [美]韩南：《谈第一部汉译小说》，叶隽译，《文学评论》2001 年第 3 期，第 132－142 页。[Hanan P.，"On the First Novel Translated by Chinese," trans. by Ye Jun, *Literary Review*, No. 3 (2001), pp. 132－142.]

[11] [美]艾朗诺、韩晗：《学术翻译要加倍小心——对话汉学家艾朗诺》，《中华文化论坛》2010 年第 4 期，第 165－166 页。[Egan R. & Han Han, "Taking Extra Caution in Academic Translation: A Conversation with Sinologist Ronald Egan," *Forum on Chinese Culture*, No. 4 (2010), pp. 165－166.]

[12] 黄卫总：《明清小说研究在美国》，《明清小说研究》1995 年第 2 期，第 217－224 页。[Huang M. W., "Studies of Ming-Qing Fiction in the United States," *The Journal of Ming-Qing Fiction Studies*, No. 2 (1995), pp. 217－224.]

[13] [美]何谷理、曹晋：《在世界范围内推动中国古典文学研究——访华盛顿大学比较文学系何谷理教授》，《文学遗产》2000 年第 4 期，第 132－137 页。[Hegel R. & Cao Jin, "Promoting the Study of Classical Chinese in the Global Context: An Interview with Washington University Comparative Literature Program Professor Robert Hegel," *Literary Heritage*, No. 4 (2000), pp. 132－137.]

[14] [荷]伊维德：《西方大学中的中国传统戏剧研究》，《上海戏剧》2016 年第 7 期，第 27－29 页。[Idema W. L., "Chinese Traditional Plays in Western Universities," *Shanghai Theatre*, No. 7 (2016), pp. 27－29.]

[15] 奚密：《文学研究与理论革命》，《社会科学论坛》2006 年第 2 期，第 81－85 页。[Yeh M., "Literary Studies and Theoretical Revolution," *Tribune of Social Science*, No. 2 (2006), pp. 81－85.]

[16] [美]柯马丁：《学术领域的界定——北美中国早期文学(先秦两汉)研究概况》，何剑叶译，见张海惠编：《北美中国学——研究概述与文献资源》，北京：中华书局，2010 年，第 570－600 页。[Kern M., "Early Chinese Literature in North America: From Pre-Qin to Han Dynasties," trans. by He Jianye, in Zhang Haihui (ed.), *Chinese Studies in North America: Research and Resources*, Beijing: Zhonghua Book Company, 2010, pp. 570－600.]

[17] 田晓菲：《关于北美中古文学(建安—隋唐)研究的现状》，见张海惠编：《北美中国学——研究概述与文献资源》，北京：中华书局，2010 年，第 601－622 页。[Tian Xiaofei, "The Research Status of Middle Period Chinese Literature in North America," in Zhang Haihui (ed.), *Chinese Studies in North America: Research and Resources*, Beijing: Zhonghua Book Company, 2010, pp. 601－622.]

[18] [美]艾朗诺：《北美宋金元文学研究》，见张海惠编：《北美中国学——研究概述与文献资源》，北京：中华书局，2010 年，第 623－635 页。[Egan R., "The Studies of Song, Jin and Yuan Dynasties Literature in North America," in Zhang Haihui (ed.), *Chinese Studies in North America: Research and Resources*, Beijing: Zhonghua Book Company, 2010, pp. 623－635.]

[19] [美]艾朗诺：《才女的重担：李清照〈词论〉中的思想与早期对她的评论(下)》，郭勉愈译，《长江学术》2009 年第 4 期，第 78－87 页。[Egan R., "The Burden of Female Talent: Ideas in Li Qingzhao's *Ci Lun* and Their Early Critiques (Ⅱ)," trans. by Guo Mianyu, *Yangtze River Academic*, No. 4 (2009), pp. 78－87.]

[20] [荷]伊维德：《北美的明清文学研究》，李国庆译，见张海惠编：《北美中国学——研究概述与文献资源》，北京：中华书局，2010 年，第 636－652 页。[Idema W. L., "The Study of Ming and Qing Literature in North America," trans. by Li Guoqing, in Zhang Haihui (ed.), *Chinese Studies in North America: Research and Resources*, Beijing: Zhonghua Book Company, 2010, pp. 636－652.]

[21] 孙康宜、[美]宇文所安主编：《剑桥中国文学史》，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3 年。[Sun Kangyi & Owen S. (eds.),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 Beijing: SDX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 2013.]

[22] 孙康宜、钱南秀：《美国汉学研究中的性别研究——与孙康宜教授对话》，《社会科学论坛》2006 年第 11 期，第 102－116 页。[Sun Kangyi & Qian Nanxiu, "Gender Study in American Sinological Research: An Interview with Professor Sun Kangyi," *Tribune of Social Sciences*, No. 11 (2006), pp. 102－116.]

[23] 姚平：《前言》，见[美]伊佩霞、姚平编：《当代西方汉学研究集萃(妇女史卷)》，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 年，第 1－18 页。[Yao Ping, "Foreword," in Ebrey P. B. & Yao Ping (eds.), *A Collection of Contemporary Western Sinological Studies: Woman's History*, Shanghai: Shanghai Classics Publishing House, 2012, pp. 1－18.]

[24] [德]施寒微:《第九章 佛教文学》,见梅维恒编:《哥伦比亚中国文学史》第一编,马小悟、张治、刘文楠译,北京:新星出版社,第174-187页。[Schmidt-Glintzer H., "Chapter IX: Buddhism Literature," in Mair V. H. (ed.), *The Columbia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 Vol.* 1, trans. by Ma Xiaowu, Zhang Zhi & Liu Wennan, Beijing: New Star Press, pp. 174-187.]

[25] 王德威:《英语世界的现代文学研究之报告》,张清芳译,《海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3期,第1-5页。[Wang D. D., "A Report on Modern Literature Studies in the World of English," trans. by Zhang Qingfang, *Journal of Hainan Normal University* (*Social Sciences Edition*), No. 3 (2007), pp. 1-5.]

A Brief Review of the Study of Classical Chinese Literature in the USA

Liang Xia

(*Department of East Asian Languages and Cultures*,
Washington University in St Louis, *St Louis*, *MO* 63130, *USA*)

Abstract: Since the end of World War II, the study of classical Chinese literature in the United States has developed rapidly. The normalization of diplomatic relations between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s Reform and Opening-up policy propelled this field towards unprecedented prosperity. Since the mid-1980s, many mainland scholars have studied in the United States, which has greatly changed the background composition of scholars and students in this field. Since the 1990s, American academic institutions have gradually established online accesses to Chinese textual resources, which has made it possible for Chinese and American scholars to exchange their academic achievements in a more timely fashion. After a brief survey of the general state of the study of classical Chinese literature in the United States,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following basic characteristics of the field: First, American scholarship on Chinese literature puts emphasis on the translation of Chinese literary texts and considers it an integral part of literary research. Second, most Chinese literature scholars in the US have received training in English and American literature, comparative literature and Western critical theories, which enables them to study Chinese literature with interdisciplinary approaches and in dialogue with scholars on Western literatures. Third, scholars in the US tend to concentrate on studies of individual Chinese writers, works and genres. Most of their research is not conducted in the form of literary history. Fourth, the study of Chinese women's literature has become a popular trend and a fruitful subfield in the past two or three decades. Fifth, the study of Chinese literature in the US focuses on the interconnection between literature and religion, social history and cultural history, situating literature scholarship in a broad context of social environments. With the increasing exchange of information and personnel between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Chinese literary studies in both countries are becoming more and more integrated. The differences are increasingly in individual approaches only. Finally, this paper envisions possible future developments of Chinese literary studies in the US. First, more American scholars will publish in Chinese so as to reach a larger audience and communicate with their Chinese counterparts more directly; for the same purpose, a larger number of studies originally published in English will be translated into Chinese. Second, the research field of classical Chinese literature will be further expanded. Third, the number of American students who are interested in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films and popular culture is likely to increase dramatically, while the number of those

interested in classical Chinese literature might decrease. Fourth, Chinese officials and individuals will be more proactive in seeking to introduce Chinese literature and other cultural products to the US and the Western world at large. Fifth, the Unite States will be increasingly concerned with China's social developments. Finally, the augmented accessibility to Chinese information resources will not only facilitate American scholars' work but also, quite ironically, make sifting and screening of the materials a more difficult process.

Key words: USA; study of classical Chinese literature; characteristics; future development

新冠肺炎疫情下临床医学生的管理与思考

俞鸿雁　胡春燕　陈韶华　梁廷波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浙江 杭州 310003）

2020 年初，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以下简称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传播蔓延。为阻止疫情进一步扩散，国家各项防控措施密集出台，各地启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一级响应。由于新冠肺炎确诊和死亡病例数不断攀升，大众产生了焦虑、恐慌等情绪反应。临床医学生平时就面临繁重的课程任务及日益严峻的医疗竞争环境，承受了很大的心理压力（尚瑾、魏俊妮《医学生心理健康状况、心理危机源形成及相关因素研究》，载《中国高等医学教育》2017 年第 7 期，第 38－39，90 页）。国内有调研指出，我国医学生中 9％—29％存在心理障碍（程鹏《临床专业实习生心理健康状况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山东大学 2015 年硕士学位论文）。新冠肺炎疫情的暴发更加剧了这种压力。疫情暴发之初，笔者向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 265 名实习生发放了心理调查问卷，发现 20％和 11.32％的医学生分别产生了不同程度的抑郁和焦虑症状。自媒体时代下，教学管理者如何帮助医学生做出正确判断，如何保障他们的心理健康，如何及时调整教学工作思路，将疫情带来的危机转化为教学契机，并发挥医院平台在实践教学中的作用，保证教学进度和教学质量，值得思考。而探索新医科背景下后疫情时期的医学教育改革方向，提升医学生的岗位胜任力尤其是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能力，更是势在必行，对此，本文提出如下建议：

第一，加强疫情期间临床医学生的教学与管理。要强化疫情管理，及时掌握医学生每日健康动态。关爱医学生心理健康，进行心理医生和思政导师线上咨询，做好认知调整，对个别有困难的医学生进行重点监测和咨询帮助，增强其自我调节能力。加强职业素养教育，充分利用医院实践教学的特点，发挥医务人员临床带教老师和“抗疫英雄”双重身份的功能，培养医学生的医德情感，增加其职业自豪感。借助各类医学在线教学资源和平台，鼓励线上学习，在专业教师的引导下发挥医学生自主学习能力。

第二，注重后疫情时期医学生的教学与管理。医学生是未来医疗卫生事业的中坚力量，医学教育的质量将直接影响医学人才的素质和医疗的质量。医学教育不仅要培养临床医学生的岗位胜任力，还要加强其心理素质及身体素质教育，从而使其更加从容地面对未来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或各类医疗问题。医学也是一门迅速发展更新的探索性科学，要注重培养学生的科学思维和科研能力，借助教学方法和手段，提高学生的批判性思维能力和解决临床实际问题的能力。立德树人是教育的根本任务，要以临床课程思政改革为导向，通过将正反面的引导和警示及热点探索等教学内容与课程思政目标相结合，以案例形式进行教学内容设计，融入专业课程内容，实现价值性引导，提高医学生的职业素养。要以实习医院为平台，加强在实习过程中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应急演练，培养医学生的应对能力。

第三，注重加强临床师资队伍人文素养建设。要在师资培训中增加教育学、心理学和社会学等相关知识，帮助医学生提高社会适应能力。要以疫情期间线上教育为契机，整合教学资源并完善资源库建设，将医学教育与“互联网＋”有机结合，运用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教学模式，培养医学生时刻学习、终生学习的习惯，使之成为具有时代担当的医学人才。

新冠肺炎疫情的发生对医学教育提出了挑战。医学院校要以新冠肺炎防控为契机，把握医学教育的改革和发展趋势，更新教学工作思路，培养创新型、实践型、复合型临床医学人才，从而更好地应对未来复杂多变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和各类医疗问题。

（本文系浙江省重点研发计划应急攻关项目（2020C03123-7）成果）